

柳思维 ◎ 编著

远古至秦汉的 商业思想

远古至秦汉的商业思想

版
社

柳思维 ◎ 编著

远古至秦汉的 商业思想



F092.2
L756

远古至秦汉的商业思想

本书出版获湖南商学院应用经济学科建设资助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古至秦汉的商业思想 / 柳思维编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5058 - 8239 - 3

I. 远… II. 柳… III. 商业经济 - 经济思想史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F710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0853 号

责任编辑: 张 频

责任校对: 徐领弟 杨 海

版式设计: 代小卫

技术编辑: 董永亭

远古至秦汉的商业思想

柳思维 编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京津彩色印刷厂印装

880 × 1230 32 开 10 印张 210000 字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8 - 8239 - 3 定价: 2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

对中国商业思想起源的研究是我从事商业经济教学科研工作后一直存在的一种冲动与愿望。1970年8月我从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专业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贸易局，直接从事民族贸易综合管理工作，在日常的调研活动中我对该地区民族贸易的产生、发展的沿革与轨迹颇感兴趣，也多次到当地一些著名的商业集镇进行实地调查与考察，如泸溪县的浦市镇、永顺县的王村镇、龙山的里耶镇、花垣县的茶洞镇、吉首的乾州镇等湘西名镇，不过那时由于“文革”浩劫的冲击，昔日商业名镇的繁华历史难以重现，但过去市场的痕迹仍在。1978年下半年我调离政府机关从事商业教育后，成为一名专职教师，主讲商业经济、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等课程，八年的商业工作实践为我的教学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我的科研也就在这八年民族贸易工作实践积累素材的

基础上起步，我记得科研起步阶段较有影响的论文是我撰写的关于湘西农村集市贸易起源与演变的文章，这是一篇带有商业史性质的论文，曾分6次在湘西自治州的《团结报》连载，在此基础上又写成综合性论文——《集市贸易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先后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月刊、北京大学《经济科学》、《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

对商业史、商业经济思想史的兴趣随着教学科研工作的深入不断强化，我在讲课中也喜欢引用古代的商业案例及经典商业思想。20世纪80年代初，我有幸通读了胡寄窗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赵靖先生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傅筑夫先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著作以及吴慧先生的《中国古代商业史》等著作，作了十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并在有关高校的学报上公开发表了关于探讨中国古代轻商思想渊源的论文。1982年，我应邀担任了湘西广播电视大学第一届大专班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教学任务，而当时担任中央电大《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主讲教师的蒋建平先生正是我中学文科班的同学。他197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本科专业毕业后留校，当时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从事经济史教学与科研，我们开始对共同感兴趣的经史问题进行合作研究，并合著了《中国近代经济史问答》一书及《清代湖南米谷贸易货源地探讨》等论文。与此同时，我先后参加了《湘西自治州商业志》及《湖南商业志》

的编写，在此基础上，我与蒋建平先生开始酝酿研究编著《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史》，并得到我国著名商业经济学家、商业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林文益教授的鼓励与支持。1986年我起草并写出了该书的编写提纲，蒋建平先生修改了提纲并吸收了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就读经济史的硕士研究生朱贤贞、曾赛丰同志参加编写，从1986年起开始撰写初稿，我负责编撰前三章，即从远古到秦汉时期的商业经济思想。该书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支持下，终于顺利成书，这部长达40余万字、从远古到辛亥革命时期，时间跨度几千年的《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史》于1990年7月正式出版，填补了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尽管该书耗时多年，也存在不少问题，但终能在我们愉快的合作中实现了我们的一个愿望，我也感到了莫大的欣慰。

《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史》出版后我一直想对原书进行修改再版，但由于时过境迁，几位合作者的工作均有较大变动，蒋建平先生后来也从北京大学调任北京商业管理干部学院任院长。由此我便萌发了对远古至秦汉这一时期商业经济思想单独重新整理成书的想法，于是酝酿了一本《远古至秦汉的商业思想》的编写提纲，并得到了有关出版单位及有关专家的支持。从1998年开始，我便着手此书的撰写，但此时的我正处于教学、科研工作的繁忙阶段，除先后担任经济系主任、科研处处长等行政职务外，课程、专业、学科建设任务十分繁重；同

时，我作为省政协委员、省政府参事、省政府院士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民盟湖南省委经济委员会主任还有较多的社会活动，对于此书的编写只能是时断时续，一直到 2009 年初才终稿。

总之，《远古至秦汉的商业思想》一书从酝酿到成书，经过了较长时间，虽然不是高质量的深思熟虑之作，但也决非心血来潮的短平快产品。能在 2009 年成书并出版，也算是了却我对中国商业思想史的一个情结。

二

在编撰《远古至秦汉的商业思想》一书过程中，我常常被中国古代的灿烂的商业文明所感动，远古至秦汉时期的商业思想是一笔瑰丽的文化遗产，它博大精深，光彩夺目，使人历久难忘；同时，它也是诸家争鸣，各执一词，令人不断思索。

其一，这一时期纵论商业的思想家群星灿烂、名流辈出。

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和道德、哲学、文学、艺术等都属上层建筑的范畴，是从属于经济基础的，同时也反过来作用和影响经济基础。一定的社会活动客观条件，必然产生一定的思想。商业思想是经济思想的一部分，它也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产物。从远古到秦汉，特别是从春秋战国到西汉这一时期，历经了从原始公有制社会到

奴隶制社会的演进，更发生了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是中国历史上大变革、大动荡、大分化的年代，也是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脱颖而出的年代，更是学术思想史上大争鸣、大发展、大创新的年代。在学术思想领域，诸子之学繁荣兴旺，春秋时期孔子第一个私人办学、带徒传道，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至战国时期，形成了不同学派之间的争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农家等各家学派的相互争辩相互影响。虽然这一时期有过秦王朝短暂的思想专制的黑暗，但到西汉摆脱和废除了秦王朝焚书坑儒的思想专制，学术思想领域呈现开明、开放的局面，先秦诸子百家之学的继承者及代表人物又纷纷活跃起来。从远古到秦汉这一时期，中国的商业思想也正处于萌芽、起源与初步发展中，商业经济的思想、观点也呈现出纷繁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历史上的轻商、抑商与重商思想均起源和萌芽于这一时期。不但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尧帝、舜帝对商品交换及贸易都有看法，诸子百家中的代表人物纷纷对商业、市场、货币、价格发表自己的见解，如春秋时期的管仲、晏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战国时期的商鞅、韩非，西汉的贾谊、晁错、司马迁、桑弘羊，以及范蠡、白圭等。研究这一时期的商业思想，你可以与一个个古代先贤进行心灵的对话与沟通，一个个闪光的观点与论述，一句句精彩的对话与争鸣，会使我们感受古代先贤们对商业的深刻思考。

其二，这一时期商业思想不断发展的动力是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学术繁荣、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研究远古至秦汉时期的商业思想，你会发现一条线索即古代先哲们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在不同时期总会有所突破、有所完善、有所前进，在同一个商业观点的起源与演变中，你会明显感悟到继承与创新融于一体，借鉴与发展系于一身。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在新兴封建生产方式逐步取代奴隶制的背景下，社会的大变革促进了商业思想的活跃，使它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批判精神与开创性。如孔子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体脑劳动分工论，而师从孔子思想的孟子不但继承了孔子这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体脑劳动分工论，而且提出了分工可以“通功易事，以羨（有余）补不足”可以提高劳动效率的观点，发展了孔子的分工论；后来的荀子作为儒学大师，在分工论方面又发展了孔子、孟子的分工思想，从分工角度肯定了商业与其他各业的发展是一国的长久发展大计，他提出“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是“百王之所同”与“万世国久之大本”。又如关于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思想，最早是魏国的李悝提出，后来秦国的商鞅则从“农战”论角度系统地提出重农轻商思想和政策，发展和丰富了李悝的重本抑末思想。及至后来的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又把商鞅的“农战论”发展到“耕战论”，把商鞅的“重农轻商”发展为

“重农抑商”，并第一次明确提出“农本工商末”的观点，把商业视为社会的“五蠹”之一。西汉的贾谊则在前人重本抑末思想基础上又提出了“积著理论”，晁错则在《论贵粟疏》中提出了“贵粟论”，丰富和发展了前人的“重农抑商”思想。又如《周礼》中的商业管理思想许多在汉代《轻重论》中得到了发展，诸如此类的继承、创新、发展的例子还有许多。

其三，这一时期商业思想精华许多仍具有古为今用的现实价值。

当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时，也需要寻找和运用古人的商业智慧。在美国金融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还在继续深化的背景下，面对新一轮经济波动与市场波动，远古至秦汉时期的商业思想中有许多闪光的东西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仍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借鉴。这一时期商业思想的许多精华中尤其是两个方面的内容尤为珍贵：一是关于商业宏观管理思想。如《周礼》中关于规范市场组织、规范市场交易行为、规范市场商品质量等方面的思想，至今仍然是存而不废，光芒闪烁。如提出市场管理原则是为了满足社会消费需要，要做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是指凡消费者需要的商品，短缺的要使其增加，有益的要丰富，有害的商品要消除，奢侈消费品要减少。今天我们要净化商品市场，毒奶、毒油一类有害的商品及各种假冒伪劣商品，仍然要“害者使亡”。在

《轻重论》中主张国家从宏观上干预商业经营的原理、政策、措施的思想，以及桑弘羊关于国家干预商业活动采取均输、平准的思想与主张，与 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的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似乎有相通的地方，可以说中国古代的“轻重论”就是那个时期的“凯恩斯理论”，它对于今天我国在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市场的失灵不能靠市场自动调节，必须有政府的及时监管与调控，离开后者就会酿发大危机。二是微观层面的商业经营思想中有许多十分精辟的见解、观点今天仍可作为企业经营的指导思想。如孔子、孟子“以义取利”的思想和伦理关系处理上的仁义原则。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夫子建立的仁的思想，开辟了中华民族价值的根源，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的伦理、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可以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来概括，并为此而确立了一系列解决和处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满足社会伦理基本需求的道德规范，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仁爱”精神，“重义轻利”的“义利之辨”原则，其中“重义轻利”、“以义生利”正是古代商业伦理的精华，直至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许多著名的工商企业都把义利共生作为企业文化精神的核心内容与企业经营行为的规范。还有司马迁总结的春秋战国一批大商人、大实业家的经营之术，如“务完物”、“无息币”、“财币欲其行

如流水”、“货无留，无敢居贵”等，寥寥数语，高度概括，集中体现了春秋战国大商人重视商品质量、重视流动资金周转、重视薄利多销的智慧和经验，也是适应商业经营客观规律要求的商业原理，至今仍普遍适用于所有的贸易经营活动。又如范蠡“水则资车，旱则资舟”的经营原则，白圭的“乐观时变，敏于趋时”的经营见解，今天仍是企业抢抓市场经营机遇、以变应变、未雨绸缪的成功之道。

其四，这一时期的商业思想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应用性。

从远古至秦汉时期的商业思想沿革来看，很少是纯学术性研究的成果，它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文化思想的发展明显不同，而表现出强烈的应用性与政策性特征，因为这一时期人们对于商业问题的看法或争论往往是在探讨国家政权如何管理社会经济、维护国家集权统治、处理与农民和农业关系、缓和阶级矛盾时提出来，或是对一定时期国家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经验总结。如《周礼》中的商业思想，特别是国家关于管理商业活动的一系列制度规范，涉及市场组织、市场主体交易行为、市场价格、市场秩序等方面的一系列管理政策，可以称为中国最早的“市场管理政策汇编”。其次，这一时期的一些商业思想提出者本身是一国商业政策的制定者、实施者。管仲、商鞅的商业思想是他们在作为治国的政治家、改革家在主政时提出来的，因而其商业思想具有政策性、针对性、可操

作性。如管仲被齐桓公重用为相，在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经济、发挥齐国比较经济优势的过程中，重视渔盐之利，适当调节商业，控制货币，平抑物价，管仲的商业思想实质就是齐国管理商业实践活动的反映；商鞅的商业思想也是商鞅变法实践中实行农战政策在商业问题上的反映。其他如《轻重论》中的商业思想，西汉桑弘羊、贾谊、晁错的商业思想，更是针对西汉王朝为改善宏观经济管理，加强中央集权，缓和阶级矛盾而提出的一系列对策，其中桑弘羊的商业思想成为西汉王朝商业政策的主要部分，充分运用到西汉的经济管理实践中，其“盐铁专卖”已成为经典的政策案例。以上说明商业思想作为一种应用经济学思想，它的生命力就在于既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又是具有指导实际经济活动的应用价值较高的经世致用之学，它不是一种束之高阁的空洞理论，更不是一种闭门造车、坐而论道的纯粹经院之学。今天我们从事应用经济学研究也应向古人学习，注重紧密联系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实际、联系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新阶段的实际，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与民生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研究，努力提供具有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不断开辟应用经济学研究的新境界、新局面，为繁荣新时期的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做贡献。

其五，这一时期的商业思想仍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综观远古至秦汉之际的商业思想起源与发展轨迹，我们会明显感到其局限性，无论是重商论，还是重农抑商

论；无论是“轻重论”还是“善因论”，既有许多科学的成分，也夹杂了一些不合理的东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尽管中国远古至秦汉之际中国的商业发展走在世界前面，但由于奴隶制、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是基础，代表统治阶级的国家利益与农奴或农民的利益矛盾集中体现在剩余劳动及其产品的分配上，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部门，因而当时还不可能对商业发展做独立的问题来探讨，多是在探讨农业、土地制度、地租等问题时，涉及商业、市场、货币、价格问题。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人们在谈论商业问题时，不少是从维护封建专制的集权统治和维护封建自然经济的立场出发，难免不以感情代替理性，甚至抱着消极、敌视的态度去议论和分析商业、市场、货币的，因而对上述事物的某些看法容易走上极端。如韩非不但提出“农本工商末”，而且将商业作为社会“五蠹”要加以消灭的观点，就近于荒谬了。又如西汉的晁错在主张“重本抑末”的同时，还提出要“废钱”、“废银”，即由政府宣布废除货币的特殊职能，“以粟为赏罚”，这也相当荒谬。又如《轻重论》中过分夸大国家政权干预经济、干预商业发展的功能，陷入了“国家万能”误区，认为国家可以令市场物价或狂涨或暴跌等。此外，由于唯心主义的哲学观、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也使古人对商业、市场、价格、供求的一些看法只能局限于在表象和浅层次上的研究，而对商品价值、市场供求规律、商业发展规律、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相互制约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商业思想的萌芽	(1)
第一节 中国商业活动的起源	(3)
第二节 中国商业思想的萌芽	(13)
第二章 商周时期的商业思想	(19)
第一节 商代的商业思想	(21)
第二节 西周的商业思想	(35)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思想	(55)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活动	(57)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思想概述	(75)

第四章 管仲、晏婴、子产、单旗的商业思想	(83)
第一节 管仲的商业思想	(85)
第二节 晏婴、子产、单旗的商业思想	(97)
第五章 孔子、孟子、荀子的商业思想	(109)
第一节 孔子的商业思想	(111)
第二节 孟子的商业思想	(118)
第三节 荀子的商业思想	(127)
第六章 墨家、农家及法家的商业思想	(133)
第一节 墨家和农家的商业思想	(135)
第二节 法家的商业经济思想	(141)
第七章 《周礼》的商业思想与治生之学	(157)
第一节 《周礼》中的商业管理理论	(159)
第二节 “治生之学”中的商业经营思想	(168)

第八章 秦汉时期的商业发展与“轻重论”	 (187)
第一节 秦汉时期商业经济的发展	 (189)
第二节 “轻重论”中的商业思想	 (205)
第九章 贾谊、晁错、司马迁的商业思想	 (225)
第一节 贾谊、晁错的商业思想	 (227)
第二节 司马迁及《史记》中的商业思想	 (237)
第十章 桑弘羊及王莽、班固、王符的商业思想	 (255)
第一节 桑弘羊的商业思想	 (257)
第二节 王莽、班固、王符的商业思想	 (272)
主要参考文献	 (293)